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金光耀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1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金光耀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1

复旦大学
近代史学系
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金光耀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6

ISBN 7-5325-3000-0

I. 顾… II. 金… III. ①外交史-研究-中国-民国②顾维钧(1888~1985)-人物研究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814 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1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金光耀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5 字数 469,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7-5325-3000-0

K·332 定价:28.00 元

前 言

本书是 2000 年 9 月 15—16 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这次讨论会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区文化局共同主办,由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和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资助。

在 20 世纪上半叶,顾维钧(1888—1985)无疑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交家。他从民国元年(1912)进入北京政府外交部开始外交生涯,一直到 1956 年从外交界退休,在中国外交界服务长达 44 年。在这期间,他担任过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使节及出席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也担任过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还出席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讨论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并且经历了这一时期中国绝大多数重要的外交事件:“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参战、临城劫车、解决中俄悬案、修约外交、李顿调查团、布鲁塞尔会议、中英新约谈判、争取美援……像顾维钧这样在外交界服务时间如此之长,担任过的外交职位如此之重要,经历过的重大外交事件如此之多的外交官,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上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由于顾维钧的一生与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紧紧地联在一起,因而对他的研究就不仅仅与他本人的外交生涯相关,而且也必然涉及到民国外交史上一些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共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四十多名学者,相聚于复旦,围绕“顾维钧与中国外交”这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

民国外交史是一个成果较多的研究领域,但相对于对外交政策和重大外交事件的研究来说,对外交人物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而民国时期的外交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现象,即出现了一批职业外交官。这批外交官大都毕业于欧美的著名大学,以外交为他们的终身职业,几乎不介入或甚少介入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顾维钧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职业外交官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外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而这一群体的出现反过来又对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民国的对外关系。因此,以外交活动的主体职业外交家为研究对象,将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更深入、更全面地审视民国外交,从而有可能在整体上推动对民国外交史的研究。

本书各篇论文的作者,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也有海峡两岸年轻新锐的博士研究生,而大多数是在当前学术界十分活跃的中生代学者。

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当年曾与顾维钧面对面作访谈、参与完成鸿篇巨制《顾维钧回忆录》,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独具特色的笔调,叙述了《顾维钧回忆录》的编撰和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中美关系史的著名学者资中筠教授,则将顾维钧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着重揭示了他“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角色,除了这两篇从大处着手的文章外,其余各篇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顾维钧外交生涯的某一片断作了研究,而以下三个课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共同关注。

不平等条约的修订及顾维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是顾维钧投身外交的原动力,也是他一生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从在巴黎和会参与起草《中国希望条件说帖》,到1943年中英新约谈判,可以说,他经历了民国时期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全过程。多篇论文的作者肯定了顾维钧在这一过程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扮演的主要角色。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

系一直是外交史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而本次讨论会有六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这么集中地讨论这一问题,为以往所罕见。这些学者以第一手的外交史料为基础,论述了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和参与创建联合国中的作为,强调了他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的评析是会议论文的又一个重点。与会学者或将顾维钧与其他外交家作比较,或剖析他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知识结构与角色认同、历史地位与贡献等方面,或将视角从职业外交家移向“学人外交家”。

除了所提交的论文外,在会议的讨论辩驳中,还涉及到民国外交史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①“弱国无外交”是概括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屡遭屈辱最常用的词语,此词语实际包含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因国力弱而一无是处和因国力弱而无法办外交的判断。会议中,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顾维钧一生办外交中许多成功的事例,就是对“弱国无外交”这一提法的有力挑战。有学者提出,一方面,一国外交的成就确与其国力相关,另一方面,强弱并不能仅仅以军事力量来衡量,如果本国内部团结,政治清明,决策集团判断正确,又有高明的外交能手,就可以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靠外交尽最大可能争取到于己有利的协议,或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事实上,越是弱国越需要外交,越是弱国越体现外交官的职业技能。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国一直处于弱国的地位。但正因为是弱国,受列强欺凌,就有许多对外交涉,就更需要外交。在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上,弱国的外交家确实面临着诸多的尴尬和困境。但顾维钧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以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非凡的才智,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交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他个人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以顾维钧的经历,我们可以说,弱国可以出伟大的外交家。

如何评价国民外交,在讨论会上也歧见纷纭。国民外交是民国初年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后,普通民众通过舆论、游行、示威等方

式介入外交事务而出现的现象,在巴黎和会期间渐成声势。顾维钧本人对国民外交持有异议,因为它“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讨论中,有学者将近代以来少数高级官僚所专擅、阻断民意表达的外交称为纯粹官僚外交,认为这使本已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外交由于缺乏民意支持而更加虚弱,而国民外交在北京政府修约运动中起了作用,它既是民意基础,也起到监督作用,给北京政府以巨大压力,促使其下决心宣布废约。对列强而言,国民外交显示出来的巨大的民意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影响列强决策,对北京政府修约取得一些进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国民外交包括公众舆论与直接行动,如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民众所组织的种种活动,已超越了舆论的范围。国民外交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五四”运动对于巴黎和会所起的作用。它也可能起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这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能否因势利导。

会议期间的热烈讨论,除了各位论文作者外,还得益于论文评论者的真知灼见。这些评论者是:陶文钊、罗志田、汪朝光、陈鹏仁、胡礼忠、邵铭煌、吴景平、王念祖、杨奎松、张济顺、唐德刚、唐启华。

总而言之,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和会议期间的讨论表明,围绕“顾维钧与中国外交”这一主题,这次讨论会确实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有所推进。

但是,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汇集了会议论文的这部书稿也有一些缺憾。譬如说,在结构上尚欠全面,顾维钧在其外交生涯的最后十年处于中美关系的风口浪尖,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美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转折期。可惜的是,现在只有一篇论文涉及这一时期。此外,对顾维钧在国内政争中的政治取向、他所代表的外交家群体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展开并作深入的探讨。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学者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向与我共同策划、组织这次讨论会的上

海嘉定区文化局沈云娟局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王念祖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石源华教授,对全力支持会议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曾小苹(Madeleine Zelin)教授和我所工作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前后两任系主任顾晓鸣教授、吴景平教授及顾云深教授,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杨雪兰女士及徐景灿女士,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周斌教授、周桂发副处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顾维钧的长女顾菊珍女士以耄耋之年,远涉重洋,亲临讨论会,并就顾维钧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张晓敏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纯先生及李志茗先生,他们的大力支持和中肯的意见使本论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王蓉、王天广参加了本书的编务工作,张静波、刘金华对各篇论文作了摘要,并译成英文,在此一并致谢。

金光耀

2001年2月于复旦园

① 会议的讨论情况及各位学者的发言内容,参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本次会议综述。

目 录

前言	金光耀 1
1. 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	〔美〕唐德刚 1
2.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资中药 29
3.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	廖敏淑 52
4. 顾维钧与北京政府对国际联盟的 参与 (1919—1922)	唐启华 86
5. 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 ——兼论初入北京政坛的顾维钧	汪朝光 113
6. 北京政府修约运动简论 ——兼述顾维钧等新一代外交家的崛起	王建朗 132
7. 废约外交: 顾维钧民族主义及其运作个案	岳谦厚 150
8. 顾维钧与中苏建交谈判	赵胜土 168
9. 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 ——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外交活动	曹振威 183
10. 1933 年中国对日绝交计划的浮沉 ——兼析《顾维钧回忆录》的有关观点	鹿锡俊 204
11. 顾维钧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 合作	张 力 220

12. 顾维钧在国联 [英] 胡永宁 237
13. 顾维钧与中英平等新约 陈立文 245
14.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从中国代表团报告书看“中国的自画像”
..... [日] 西村成雄 271
15. 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金光耀 286
16. 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 李朝津 303
17. 顾维钧在朝鲜战争初期对美交涉中的角色 刘维开 322
18. 外交家的诞生：顾维钧与近代中国
外交官文化的变迁 王立诚 344
19. 学人外交：从幕后到前台
——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章 清 358
20. 重评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
——兼论《顾维钧回忆录》在大陆翻译出版的
学术意义 石源华 385
21. 论陆徵祥与顾维钧
——兼论在巴黎和会上的作用问题 石建国 398
22. 顾维钧与陈友仁 钱玉莉 417
23. 顾维钧与杨杰
——战时中法军事合作谈判中的冲突 陈 雁 429
24. 顾维钧与塔列朗
——一个比较研究 金重远 443
25. 评中文版《顾维钧回忆录》 [美] 朱葆璠 456
26. 《顾维钧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初探
——从哥伦比亚大学收藏、未收入回忆录之档案
内容来探讨 [日] 川岛真 460
27. 顾维钧的经世品格及其成因 谢俊美 沈 潜 474

-
28. 论顾维钧的人格魅力 戴鞍钢 490
29. 顾维钧研究概述 傅德华 傅 骏 496
30. 为现代蔣相如立传
——评金著《顾维钧传》 徐有威 506
31. 忆顾大使少川先生(五律五首) [美] 王念祖 511
- 英文提要 513

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

〔美〕 唐德刚

顾维钧先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我所谓职业外交官，不但是说他一辈子的主要职业是从事外交工作，而且包括这一层含意，即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所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也都是服从于培养担任外交官的目标，再用一句通用的俗语来表达，那就叫做“科班出身”。加以他的天生资质，就有做外交官的禀赋。古人说一个人一生的成就，有所谓“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时也”的说法。换言之，一个人虽适合做某项工作，但没有做那项工作的机会，也是枉然。而顾氏则才遇两全，所以他的一生，在职业方面的成就，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他作了最适合的配合，因此我们才能说他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职业外交官”。

我个人在不同的拙作里曾提到，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而顾维钧则是“半个”。这又从何说起呢？原因是顾氏虽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做到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但是他都是为人作嫁，奉命工作，他自己一辈子也未曾享受过决策权。

顾维钧先生活了近一百岁，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他老人家又是一位心细如丝，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和详尽的日记作家。他把每日所处理的公私大小事务，都不厌其详地记下来，公私文件也全部保存，真是海内外所仅见。他晚年又留下了一部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有一万余页，译成汉文共十三巨册，实是近代中国名

人回忆录中最详尽的一部。纵是说说这部回忆录是怎样编写的？其要义又何在？就凭这两点，便可以，也应该写出一部数十万言的史料书，流传后世。我个人因为始终亲身参与其事，为顾老所逾格信任，而这些故事又鲜为人知，因此心头时有疙瘩，想把它笔之于书，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留点罕有的史料。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所见，全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国宝，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逐渐流失，内心发生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憾，与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单之感，真非亲历者不能体察于万一也。

所以上次金光耀教授访美时，我曾把在海外做文化小班超的这一点孤独的心情，略言一二。曾自信文不加点，就可以写出数十万言的史料书来，而这些史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难得和最真实的史料。这本是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华侨，一时兴起，未加深思的狂狷之言。谁知言者无意，而听者认真，今次竟蒙金教授据此而盛意宠召，来参加这次盛会。笔者已退休多年，八十老头，在海外乡居，除草种菜，散步读书，本无意越洋旅行，“将谓偷闲学少年”，来参加国际会议。然自思今次参加大会的有学术界、外交界的年轻朋友们、领导们，所以我也就不自嫌老迈，乘此机缘，向大会作点简单的报告。至于《顾维钧回忆录》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真正的要义又何在？言多纸短，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了，所以我只想举一些杂乱而有趣的小例子来谈谈，在大会中抛砖引玉吧。

现在谨先谈谈《顾维钧回忆录》是怎样经过录音编写的。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

《顾维钧回忆录》英文原稿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录音编撰的。而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又算是该校有国际性的“口述历史学部”的一部分。至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得从哥大的特性说起。哥伦比亚和它的

姐妹学校,哈佛、耶鲁等等所谓“长春藤盟校”,都是一种所谓“研究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学校工作的重点是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这些长春藤盟校中的教授,在那时每周上课的时数,都不超过四小时。其中还有两小时是属于讨论班(Seminar)的。在讨论班中教授不授课,只是听取学生报告其作业,而加以评论指导。教授爷只是皮椅高坐,烟斗横衔,无所事事。

这一情况,外行人乍听起来,会认为当个教授是何等闲散。其实他们都忙乱不堪。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各有其研究的专题要做,做起来都是夜以继日的。加以美国又是个极其忙碌的竞争的社會,大学里也有“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教条。虽然当今在美国教育界也有所谓“星期三开始度周末的教授”,但是这种懒教授在一些名大学是很难长期寄生的。所以每个教授,为着学术兴趣,或单纯地为着名利,都忙碌不堪。二战后的美国又因发了战争财,一枝独秀,繁荣透顶,资助学术研究的基金随处皆是。一位名教授如有个新鲜的研究项目和计划,不愁没有基金会慷慨解囊。所谓“口述历史计划”,在当时就是个近似天才发明的新花样。因为那时发明的钢丝录音机初上市,而二战后的美国又难民如潮,许多好说当年勇的战时或战前的名人政要,又都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他们自己撰文写稿,无此设备,自己也往往无此功力。这时哥大历史系有位教授美国史的名教授亚伦·纳文斯,乃头脑一动,利用起高科技新发明钢丝录音机,搞起“口述历史计划”来。一时风行草偃,基金会补助,财源滚滚而来,“口述历史”一辞,也就名满天下了。

这时正值国民党打了败仗,无数名人政要也都流落在纽约街头,有话要说。因此东亚研究所中一名美国汉学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也就效仿,筹了一笔小基金,组织了一个“计划”来访问中国战败的要人。这便是“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成立的经过,时在1957年的秋季。

至于我个人为何被卷入这个新行业呢?我在不同的拙著里,

也曾零星地略作交代。如“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见近版《李宗仁回忆录》“附录”,和该书英文原版中笔者用英文所写的“自叙”);和拙著《胡适杂议》末章“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以及蒋永敬教授主编的《陈立夫回忆录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6月,台北“国史馆”印行),第一章拙作“陈立夫早年哥大口述回忆残稿勾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学人所写下的访问闲谈的一些纪录,如青岛社会科学院王书君教授所写的《“顾维钧回忆录”撰写秘史》(原载《青岛研究》),由已故刘绍唐先生代为收入拙著《书缘与人缘》(1991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页99—105),但都是一种随笔式的写法,没有作认真的报导。本篇限于篇幅,也只能大致说说,让与会贤达略知一点著作的背景就是了。

搞口述历史是会上瘾的

我们那个迷你口述历史学部,由于经费不足,管理也不够理想;它从头到尾,一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其他都是些只拿“钟点费”或“半薪”的临时雇佣的助理。这两个全时研究员便是我和夏连荫女士。她原名莲英,因为不喜欢那女孩儿家的名字,才按音改过。她那时是哥大校园中很有名气的年轻貌美的上海小姐,大家都知道的 Ms Julie How(夏字上海音读How)。茱莉与我原是哥大历史系研究部的同学,又同在系中做助教或助理。笔者做博士生时的主修科目是美国史,纳文斯教授原是我主修科目中最主要的导师之一,跟他在口述历史部做助教助理的同学,都是一批好朋友。他们那间有咖啡壶的小办公室,也是我们的当然俱乐部。而当时夏连荫和我,又都是东亚研究所代所长韦慕庭教授的助理,因此教授爷在历史系里搞起“口述历史计划”来,我们这批小助教助理,就顺理成章地当起访问员来了。

原来在这种所谓“学部或计划”(Research Projects)中兼差的研究生,都是临时性质的。博士生们一旦通过了那个鬼门关、奈

何桥的“综合口试”之后，就远走高飞，应聘去他校做助理教授去了。那也是当今美国科举中的“正途”。因此这助教助理的职位原是一种流水席，成员是变换不停的。可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里的茱莉和我，却“困”下来了。我一困十余年，茱莉则几乎困到她殉职为止。

何以如此呢？第一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对象不同。凡参加口述历史的欧美名人，几乎都是临时性质的。口述完了，存档，保密，了事。中国名人如李宗仁、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发奎、顾维钧等等，都是志在写大书。一本书（像《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陈立夫回忆录》、《孔祥熙回忆录》、《张发奎回忆录》等等）认真地写，往往就可使一个小助教写一辈子。

第二，写书是有“瘾”的。老实说茱莉和我，当时都上了口述历史的瘾，不能自拔。在美国科举中“正途出身”，去干这种“非正途”的工作，是一种极大的自我牺牲。因为它工作辛苦，待遇菲薄，福利（如“退休金”和“社会保障金”）毫无，不算资历。所以干这种事，实在是非瘾君子不为也。茱莉犹可说，因为她是富商独女，不向钱看，加以她那时又是单身，无心读博士。我个人则完全是上了瘾，和为传统士大夫“不为稻粱谋”的臭习惯所驱使的结果。

第三则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安土重迁，安于现状的惰性使然，与其下放小州（青海、贵州、亚里桑那）去做个教授，倒不如留在大城市（上海、北京、纽约）扫扫街道的好，我个人就是这个心理作祟，留在哥大，一留二十五年，但是当时有许多中国同学们，还羡慕我能“留下”呢。

两个人访问五个人

我们这个渺小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成立之后，最早应聘受访的中国名人，一共只有五位，他们是：孔祥熙、陈立夫、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前四位当时都在纽约退休定居当寓公，日长昼永，

时间多得是，我们可以尽情访问。只有顾维钧先生一人，那时尚未退休。他在海牙国际法庭当法官，但是他的“家”却在纽约，因此每年要回家度假三个月。我们就乘他在这三个月假期中，全时访问。因此当时茱莉和我的工作就这样分配了：

孔祥熙、陈立夫两先生，都是国民党中央系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就由茱莉包办了。

李宗仁先生，这位“杂牌”领袖，和胡适先生，这位“学者”，则归我负责。

顾维钧先生，这位世界驰名的外交家，则由我们二人共同负责，每年只访问三个月。

工作分配好之后，我们二人就正式工作起来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忙得可起劲。等到顾维钧先生第一次返美度假时，茱莉自告奋勇，要打头阵去访问，我则帮她搬那足有二三十磅重的原始录音机。茱莉年青貌美，英语流畅，打扮入时，访问起来，真像当时上市不久的彩电节目，使我钦佩无已。可是未出两周，她就有点泄气，意欲倦勤，并央我接手。其原因便是顾氏把他的回忆录看得太认真了，由于时间短促，他要求殊多，而工作量甚大。尤其是他讲完有趣的儿童时代之后，美国的穆尔、古德诺、威尔逊和中国的唐绍仪、袁世凯都上台了，为求故事正确，查对史料就在所不免了。花两小时查对正误，原属当然，一查七八小时，就是沉重的工作了。我们二人原是共同工作，全力以赴，但是茱莉却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自己不把这七八小时的准备工作弄清楚，访问起来就有口齿不灵之感，渐渐地她感到吃勿消，就苦苦地哀求我来接手了。我们原是共同工作嘛，她硬是不要做了，我想逃也逃不了，我接手之后，她叹口气说，感到好轻松，古人所谓“无官一身轻”，大概就是这个滋味。